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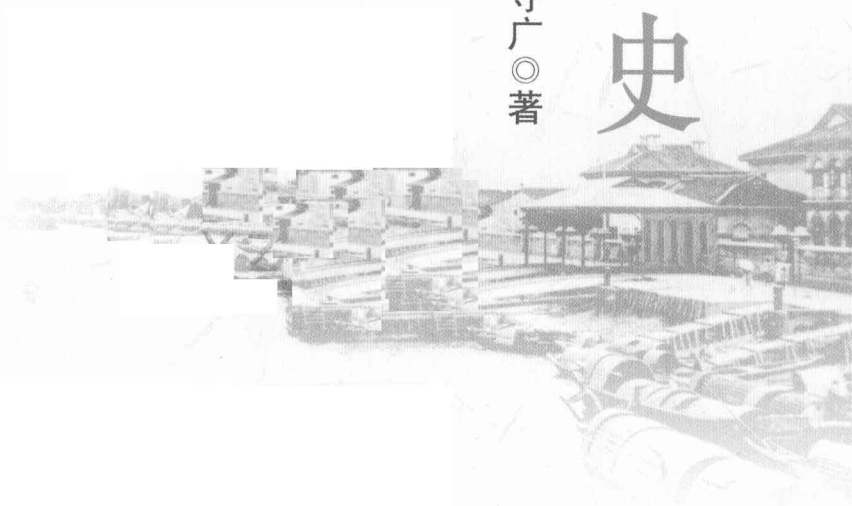
宁波商帮史



张守广 著
NINGBO SHANGBANGSHI
宁波出版社

宁波商帮史

张守广◎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商帮史 / 张守广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526-0121-3

I. ①宁… II. ①张… III. ①商业史—研究—宁波市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1738 号

宁波商帮史

张守广 著

-
- 选题策划 马玉娟
责任编辑 吴波 王晓君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8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121-3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1-85164620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学术界宁波商帮史研究的兴起	(1)
一、20 世纪的宁波商帮史研究	(1)
二、最近十年来的宁波商帮研究	(20)
三、宁波商帮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	(33)
第二节 目的和意义、概念、方法与框架	(36)
一、目的和意义	(36)
二、基本概念：宁波、宁波人、宁波帮与宁波商帮	(37)
三、本书采用的方法、主要内容与框架	(48)
第一章 宁波商帮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52)
第一节 明清时代经济、社会变动中的沿海、沿江与宁波	(53)
一、明清时代经济变动中沿海、沿江地区经济与社会动向	(53)
二、15 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与西方势力的东来	(61)
第二节 宁波港与宁波区域经济	(73)
一、宁波港及其历史地位	(73)
二、宁波区域经济与社会	(78)
第三节 厚重独特的宁波区域文化	(88)
一、宁波区域文化与教育	(88)
二、浙东学术演变与社会价值取向	(90)
第二章 清代乾嘉道时期宁波商帮异军突起	(96)
第一节 宁波商帮形成的曲折历程	(96)
一、源远流长的早期明州海商	(96)

二、 宁波商人在清初以前的发展与挫折	(98)
三、 清代宁波商帮的形成	(100)
第二节 宁波商帮商业网络的地域分布	(105)
一、 沿海和海外地区	(106)
二、 沿江与内陆地区	(113)
第三节 宁波商帮商业网络的行业分布	(116)
一、 宁波帮海商经营船运业	(116)
二、 钱庄业与民信业	(121)
三、 鱼盐、南北货业	(126)
四、 其他行业	(127)
第四节 清乾嘉道时期宁波商帮的整体考察	(131)
一、 基本构成	(131)
二、 商业组织	(136)
三、 商人伦理	(138)
第三章 晚清与民国时期宁波商帮的转型与困境	(142)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机遇与困境	(142)
一、 宁波开埠与港口贸易	(143)
二、 西方宗教与文化传入宁波	(146)
三、 宁波商帮社会基础的扩大	(148)
第二节 现代化转型的初步展开(1840—1900)	(151)
一、 宁波帮新式商人的崛起	(152)
二、 传统行业的发展和蜕变	(168)
三、 创办与经营现代企业的初步尝试	(183)
四、 宁波商帮的壮大与传统组织形态的变化	(191)
第三节 现代化转型的基本实现(1901—1931)	(214)
一、 宁波商帮向现代工商集团的转型	(215)
二、 宁波商帮与现代上海实业界	(228)
三、 宁波商帮在其他地区的经营活动与影响	(240)
四、 新型同乡组织——宁波旅外同乡会的产生与发展	(251)
第四节 忧患日亟与艰难选择(1931—1949)	(270)
一、 “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对宁波商帮的影响	(270)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财经政策对宁波商帮的影响	(272)

三、 抗战时期宁波商帮经济实力的严重削弱	(276)
四、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宁波商帮	(305)
第四章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宁波商帮	(317)
第一节 港澳台、海外宁波商帮的奋斗与辉煌	(317)
一、 当代宁波商帮对香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贡献	(318)
二、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工商业者及其经营活动	(329)
三、 港澳台与海外宁波商帮的同乡团体	(330)
第二节 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建设故乡	(335)
一、 港、甬两地甬港联谊会的成立	(335)
二、 卢绪章与包玉刚	(336)
三、 当代港澳台及海外宁波商帮对祖国和家乡的贡献	(340)
第三节 宁波商帮的曲折与新宁波商帮的重新崛起	(342)
一、 老一代宁波帮工商业者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贡献	(342)
二、 改革开放后新宁波帮的兴起与发展	(348)
三、 新宁波商帮的组织形态	(357)
第五章 结束语:辉煌与超越.....	(367)
第一节 特征与特色	(367)
一、 持续发展的成功典型	(367)
二、 命脉所在的航运事业	(372)
三、 事在人为的商帮精神	(375)
第二节 故乡与故国	(379)
一、 故乡与异乡	(379)
二、 家族与同乡	(385)
三、 故国与世界	(388)
第三节 传承与超越	(392)
一、 大时代在召唤	(393)
二、 勇于开创新风	(394)
三、 超越值得期待	(396)
参考文献	(400)

绪 论

宁波商帮自清代形成以后,一直到当代中国依然能够曲折而持续地得到发展,这不能不说是近三百年来中国经济史上的“异数”。但这个“异数”也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同时还表明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发展经济、富裕民生的巨大潜能。故研究宁波商帮的意义,不只在在于宁波商帮本身。

第一节 学术界宁波商帮史研究的兴起

宁波商帮史是宁波帮历史研究的主体,从20世纪初开始到目前,相关研究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演变史。实际上,宁波商帮研究学术史已经成为宁波商帮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学术史加以梳理,对于宁波商帮史研究的顺利进行,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的宁波商帮史研究

宁波商帮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历史阶段,活跃于当时中国经贸历史舞台上且最为引人注目的商帮无疑是徽商和晋商。徽商以盐业、典当业、茶业、木业为主要行业,^①晋商以盐业、丝业、粮食业、棉布业、铜铁业、汇兑业为主要行业,^②到明代中后期,徽商、晋商已经积累起巨额的财富。生活于明后期的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

^①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1版,第109页。

^② 刘建生、刘鹏生等:《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页。

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①明人王士性也说：“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与声势煊赫的徽商和晋商相比，当时的宁波帮商人在资金、实力、影响上确乎逊色不少。宁波商帮擅长并注重经营江海航运的特点，使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明清两代封建政府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海禁政策的严重束缚、压抑和摧残，屡仆屡兴，但仍以令人惊叹的顽强与坚韧，不断地为自己开辟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到清康熙帝开放海禁之后，特别是1840年以后，宁波商帮获得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愈来愈多的发展机会，并迅速发展成为超过其他地域商帮的一个著名商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宁波帮商人在我国内地几乎销声匿迹，惟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宁波商帮仍在继续发展，并抓住一系列发展机遇，特别是抓住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以英资为主的外资从香港撤退的历史机遇，再次扩大了其力量 and 影响。同时，1978年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宁波帮商人热烈、积极响应，新一代宁波籍工商业者也乘势重整旗鼓，迅速发展和不断壮大。海内外宁波帮商人也由逐渐接触到交融与合流，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并在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及宁波地区对外经济联系与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宁波商帮在清代兴起后，就引起了另一个颇有势力的沿海商帮——福建商帮的注意。因为在清康熙、雍正和乾隆初期，福建帮铜商曾经是富甲一方的东南洋铜商的主要力量。可是，到清乾隆中后期，宁波帮洋铜商迅速兴起，并大有取代福建帮洋铜商地位的趋势。为此，福建帮洋铜商向乾隆皇帝状告宁波帮洋铜商奉日本正朔、里通外国。大概由于宁波帮商人在乾隆时期征讨大小金川之役中发挥了不小的经济作用，所以头脑清醒的乾隆皇帝并没有对宁波帮洋铜商采取特别的制裁措施，所以此事对后来宁波商帮在沿海航运中持续扩张力量并没有造成大的阻碍。清嘉庆、道光时期，江浙地方官员为降低漕粮运输成本，开始筹议漕粮海运。如江苏巡抚阮元在清嘉庆时期认真考察了北洋航线上各地域船帮

^① (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② (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6页。

的情形,^①其中就包括了宁波船帮。在清道光初期试行漕粮海运的过程中,宁波帮海商不仅成为重要的海运力量之一,而且在漕粮运输中成绩突出,一批宁波帮海商因而受到清政府颁授各级功名、职衔的奖掖。与此同时,浙东盐业的经营主体,也随着徽帮盐商逐渐本地化等原因由宁波帮盐商取代。这样,到清嘉庆、道光时期,宁波出现了地方官和商人权力倒置的现象。担任过清代宁波知府的段光清清楚地记载了这种现象:宁波鄞县例有盐课,到乾隆年间,盐商“势焰日盛”,“嘉庆及道光初年,地方官更艳商人之利,惟商人之命是听。宁波商人日益富盛。”^②清咸丰、同治时期,由于太平军势力兴起并横扫中国东南半壁,在剿灭这支声势浩大的反清军事政治力量时,清政府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向地方商贾富户“劝捐助饷”。宁波商帮这时候已经在上海和浙江具有烜赫的声势,宁波也因为有宁波商帮而以富著称,因此当时集中在上海和宁波的宁波帮商人就成为“劝捐助饷”的重点对象之一。当然亦有商人和富户不愿意多捐钱款的,如宁波的富户冯氏。有人奏报宁波冯氏家族财产多达2000万银两,起码应捐银两数十万。冯氏无奈,设法疏通关系,最后捐款12万两了局。总体上看,宁波帮商人在当时情况下对捐款还是自愿的多一些。宁波地方官到上海向旅沪宁波帮商人劝捐,“成效斐然”。因为商人惧怕社会秩序完全失控,惧怕战争的巨大破坏力,这种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捐出一小部分个人钱财的恐惧。宁波帮商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有人主动出钱出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旅沪宁波帮巨头之一的杨坊,就出巨资协助清政府组织了洋枪队,而洋枪队的营地之一就在上海宁波帮的大本营——四明公所。没有四明公所大多数董事和同乡的许可,洋枪队欲入驻公所至少会相当困难。这说明洋枪队的组建,不只是杨坊个人的意愿,它也反映了宁波商帮在财力上、物力上对洋枪队的大力支持。太平天国由一度兴盛而最终失败,其间曾横扫大半个中国,江浙受其影响最为严重。宁波商帮由于躲进上海这块以各国租界为中心的避风港而免遭灭顶之灾,甚至还由于出钱出力对抗太平军而获得

^① 南洋、北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自清代以后变化很大,王尔敏在其《五口通商变局》中有很详细的讨论,惟清代中晚期曾经以宁波为分界线划分南北洋则未曾论及。但据曾经在清咸丰、同治时期在宁波地区长期担任地方官的段光清在其自叙年谱中记载:宁波“北号商船只走北洋,海运亦只走北洋。盖由镇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悬海中。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海运亦只走北洋”。见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1页。

^② (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页。

政治和社会的声望,从而壮大了实力和声势,并为对付此后上海法租界当局的强占图谋积蓄了应战的力量。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四明公所两次发生血案,宁波帮工商业者和为数众多的宁波籍移民,不畏强权,不怕流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最后迫使上海法租界当局不得不承认宁波帮对上海四明公所的完全产权。宁波帮同乡凭借乡帮的力量,在上海这个西方势力侵入中国的桥头堡,与处心积虑力图强占公所、代表法国强权的法租界当局及法国驻华领事抗争并维护了自己的权益,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奇迹。如果考虑到这个奇迹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由衷的敬佩。两次事件的结局,不仅增强了上海宁波帮的凝聚力,而且对宁波商帮的进一步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清末民初之际,宁波商帮财势雄厚、人才济济,在上海的商帮中几乎形成唯我独尊的气势。因此,当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筹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时候,才力邀宁波商帮代表人物严信厚、朱葆三等出面办理,并倚为中坚,从而办出了显著的成绩。孙中山在进行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也得到过旅日宁波帮巨商吴锦堂等人的大力支持和资金帮助。1916年8月,孙中山到宁波,在其演讲中盛赞宁波人在经商方面的能力与影响。他指出:“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又说:“宁波人既素以善于经商著,且具有伟大之魄力。”^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帮商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显著的发展,涌现出了为数众多且精明能干的银行家、工业家、航运家和著名商人,其中不少人以人望和财力成为著名的工商界领袖,可谓盛极一时。因此,宁波人常被拿来与善于经商的犹太人相提并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②。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对宁波商帮在工商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抗战中期的大后方,周恩来曾经参观宁波帮工业家余名钰与四川著名航运家卢作孚在重庆合办的渝鑫钢铁厂,并欣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③当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解放大军在“将革

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第350、352页。

②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页。

③ 《周恩来同志为渝鑫钢铁厂题词手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扉页第1页。

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向东南沿海挺进之时，毛泽东特意致电前方将领粟裕、张震等，明确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①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为调动积极因素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步伐，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有关汇报时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②宁波商帮不断在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指示和讲话中出现，充分说明了这个商帮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领域。

宁波商帮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始于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著名刊物《浙江潮》曾经连续刊载《浙声》、《浙风篇》等重要论文，并论及宁波帮商人和宁波社会。其中《浙声》中指出：在浙江，宁波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商社会”，浙江杭州、温州等城市的工商界，皆由宁波帮商人主导：

我浙江有独立之社会三，而浙东西之文学不与焉。一商社会首数宁波。举吾浙之解事小儿，无不知宁人以商雄于中国者矣。虽然我又放观其一群之外，以为宁人之商业精神尤可畏。吾浙江十一府之通都名会，其绝大之商场之势力圈，孰非宁人执其牛耳；而宁波一邑，富家至数百万者不少概见。况以数十年前风气未开之日，宁人之携重资走海外者，动数百万人，而其足迹所经之地，必有一非常固结不可解之团体。而海上会馆一事，旬日之间，苍头走卒，莫不奋臂与法人死抗至血肉狼藉而不悔，是亦宁人之一大特色矣。夫泰西文明国二百年来已商业为世界问题者，夫人既知其说矣，而彼族之大官通人、缙绅硕士，不惜著为学说，伸其权力，挥张而扬厉之，以商业自由为当时倡。於乎！彼族之以商力陶铸全球者，非无故也。我宁人何待乎？以云国力，则鱼肉无时，驱之惟恐不暇。而一二读书之士，与夫巨室大老，又鄙之为市侩，薄之为商贾，不屑与之通一语。或有一二自海外挟资归乡里者，则亲戚交游百端，以身家口腹累之而公论不以为非。於乎！此不能不

① 毛泽东：《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②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页。

归咎于中国之积习矣。然宁人独能百折不回，视重洋为户庭，逞其冒险进取之心，走异国不稍退。於乎？此岂宁人种姓之特别与？……

一工社会。浙江非以工名者也，而居然有大工厂若隐若现，若塞若通，掩耀于大江以东者，温州是也。……而其商权反握于宁人之手。^①

《浙风篇》中指出：

吾浙人之能以社会雄者，则惟宁、绍两府人。宁波通商最早，其人也工于计，富于团结力。今宁人相率为海外事业者，各埠不绝其踪迹。其次亦能于本省商界上占势利焉，如杭，如温，凡上等商社会，皆宁人也，而绍人则尽占其下焉者。^②

两篇文章都刊载于1903年的上半年，都从整体上对当时宁波帮的情形进行了论述，这两篇应该是最早的、比较集中地论述宁波帮的文字。

发表在外国学术期刊上的或外国学者的研究当以牛祖庆和根岸佑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1909年牛祖庆在国外学术期刊《综合政治学杂志》第30期增刊上发表《宁波市的实业企业形式》一文，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指出，“这是论述中国一个（近代）城市经济的最佳著作”^③。《宁波市的实业企业形式》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与宁波商帮有关的著名论文，通过该论文，宁波商帮进入韦伯这位世界级著名学术大师的视野，并在其论著中多次论及。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调查资料集《支那经济全书》12辑（东亚同文会1907—1908年版）中广泛涉及中国各大城市中为数众多的乡帮、行帮等帮口，其中亦有宁波帮。

1921年2月《钱业月报》刊载署名“半僧”的论文《宁波钱业之概略》，对宁波钱庄的沿革、种类、组织、资本、人事、账簿、开设和闭歇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记述。^④ 尽管比较浅显，但这篇文章应该是现存最早的全面记述宁波钱庄经营和组织的论文。1930年3—6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月报》刊载严燮《宁波过账制度之研究》一文，该文对宁波帮钱业通行的过

① 文诤：《浙声》，《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17日，《新浙江与旧浙江》第4—6页。

② 匪石：《浙风篇》，《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5日，《社说》第6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页。

④ 半僧：《宁波钱业之概略》，《钱业月报》第1卷第2号，1921年2月，第9—14页。

账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第一篇研究宁波帮钱业过账制度的重要论文。^①(为统一起见,原文中的“过帐”都改为“过账”,引者注)1931年9月,《银行周报》刊载日本学者有本邦造著,陶月译《宁波过账制度之研究》,对宁波当地钱庄业中通行的过账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②1932年4月,《钱业月报》刊载日本学者有本邦造著,施耀刚译《宁波之金融制度》,该文着重考察了宁波当地钱庄的会计制度,尤其是深入考察了过账制度方法细节及其利弊,对于认识宁波帮钱庄是重要的论文。^③1932年5月《银行周报》刊载冯薰《论宁波过账制度与现水之利弊及其改良办法》。^④1933年8、9月,《中行月刊》刊载署名“浙行”的论文《宁绍钱业之今昔观》(上、下),详细地考察了宁波、绍兴钱庄业兴起的原因、过程和当时的实际状况。^⑤全汉昇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中,对于上海四明公所曾经给予充分的关注,多处引用该公所的相关史实,并特别“追述从前上海四明公所与法帝国主义者抗争的事实,以表示会馆力量的伟大”^⑥。1939年8月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刊载了由徐蔚南根据根岸佶以及东亚同文会编纂各书中有关四明公所的论述编译而成的《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一文。这是最早较为系统地考察宁波帮在上海发生、发展及同乡组织状况的长篇研究论文。窦季良编著的《同乡组织之研究》由重庆正中书局于1943年出版,^⑦该书是较早关注和研究同乡组织的调查报告类著作,其中对于宁波旅渝同乡会有比较多的记述。方腾撰文的《虞洽卿论》连载于《杂志》1943年年底到1944年年初^⑧,

- ① 严燮:《宁波过账制度之研究》(1),《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80期,1930年3月,第1—8页;严燮:《宁波过账制度之研究》(2),《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81期,1930年4月,第1—8页;严燮:《宁波过账制度之研究》(3),《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82期,1930年5月,第1—5页;严燮:《宁波过账制度之研究》(4),《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83期,1930年6月,第1—5页;该文又见于稍后的《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1期,1932年5月,第68—77页。
- ② [日]有本邦造著,陶月译:《宁波之过账制度》,《银行周报》第15卷第35号,1931年9月;[日]有本邦造著,陶月译:《宁波之过账制度》,《银行周报》第15卷第36号,1931年9月。
- ③ [日]有本邦造著,施耀刚译:《宁波之金融制度》,《钱业月报》第12卷第4号,1932年4月,第2—6页。
- ④ 冯薰:《论宁波过账制度与现水之利弊及其改良办法》,《银行周报》第16卷第17号,1932年5月10日,第12—16页。
- ⑤ 浙行:《宁绍钱业之今昔观》(上、下),《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8、9月。
- ⑥ 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第115页。说明:该书200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署名为全汉升。
- ⑦ 该书最近已被收入李文海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 ⑧ 方腾:《虞洽卿论》,《杂志》第12卷第2—4期,1943年11月—1944年1月。

该文对虞洽卿的生平、事业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有较强的故事性和文学色彩,但也是研究虞洽卿的重要资料。重庆民生实业公司主办的《新世界》在1945年1月号刊载佚名撰写的《刘鸿生——中国的天才企业家》,对刘鸿生的生平和事业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介绍,赞誉“他(刘鸿生)是宁波帮创业精神的代表者,也是一个不只有天才而且能够苦干的企业家”^①。1946年《东洋史研究》第9卷第4号刊载外山军治的论文《上海绅商杨坊》,对早期宁波帮著名买办巨商杨坊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新中华》第3卷第4期刊载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刘鸿生》,该文指出刘鸿生这位火柴大王最辉煌的事业是火柴工业,并指出刘鸿生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喜欢做事,“决定了就做,做了有错,立刻去改”^②。1947年3月香港《经济导报》第13期刊载倩华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民族资本家介绍之七),简要介绍了刘鸿生的生平和事业,并指出在当时严重的经济恐慌中刘鸿生在中国火柴业中依然拥有牢固的基础。^③1948年4月20、27日香港《经济导报》刊载了钟树元《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该文简略地追述了宁波帮的起源,用较大的篇幅考察了朱葆三、虞洽卿等人的经济政治活动,以及宁波帮与国家资本(文中称为“豪门资本”)的关系等。这是一篇带有明显时政色彩,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比较系统地介绍宁波商帮的论文。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根岸佶相继出版的《商事惯行调查报告书:合股的研究》、《中国社会的领导层》、《买办制度的研究》、《上海的行会》、《中国的行会》等著作,^④对宁波帮、宁波帮买办、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力量和影响等,有大篇幅的记述和研究。如在《商事惯行调查报告书:合股的研究》一书中,论述宁波帮相关问题颇为详细,如记述宁波方氏家族在上海的经营活动,提出所谓宁波财阀、宁波财阀与上海财界、宁波财阀与上海同业组织、大宁波财阀与上海商会等相关提法问题,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① 佚名:《刘鸿生——中国的天才企业家》,《新世界》1945年1月号,第5页。

②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刘鸿生》,《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4期,1945年4月。

③ 倩华:《火柴大王刘鸿生》(民族资本家介绍之七),(香港)《经济导报》第13期,1947年3月27日,第16页。

④ [日]东亚研究所编:《商事惯行调查报告书:合股的研究》,东亚印刷所1943年刊。该材料为东亚研究所第6调查委员会学术部委员会委员根岸佶作为课题承担人提出的中间报告,因此,也可以认为是根岸佶的著作;[日]根岸佶:《中国社会的领导层》,平和书房1947版;[日]根岸佶:《买办制度的研究》,日本图书(株)1948版;[日]根岸佶:《上海的行会》,日本评论社1951年版;[日]根岸佶:《中国的行会》,日本评论新社1953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并有一批经济学家着手编辑并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①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等。这些近代经济史资料中有不少与宁波商帮相关的历史资料,如《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1961年版)、《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的《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中的《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2年版),此外还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上海财经出版社196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重印)。1960年全国政协主办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开始出刊,其中也收录了不少与宁波商帮相关的历史回忆资料。如第15辑有许念晖《虞洽卿的一生》、第34辑有庄禹梅《关于宁波旅沪同乡会》、第38辑有平襟亚《漫谈黄楚九及其事业》、第42辑严逸文的《四十年买办生涯回忆》等。上海、浙江、天津、湖北等地的文史资料中相关回忆资料还要更多一些。与大量资料涉及宁波商帮人物、企业相比,这一时期深入研究并肯定宁波帮以及宁波帮工商业者的论著极少,其中《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是个例外。该书于1956年出版,由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傅衣凌先生撰写。尽管在这一部学术史上首次用个案考察的方法对中国各地商帮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中没有专门章节详细论述宁波商帮,但明确提出了关于宁波商帮的重要观点,即浙东多海商,以宁波商帮为大,有八

^① 其中一些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才出版,为叙述方便,一并介绍于此。

百余年发展历史，嘉道之际发展甚速。^① 这至少表明，宁波商帮在中国商帮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哪怕是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被人为地放在极其边缘的位置。当然，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情况下，宁波商帮及宁波帮商人常以历史的反派角色出现在学术论著和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叙述之中，如杨坊这位早期宁波帮大买办，以筹划并资助建立洋枪队而著称，被认为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祸害太平天国事业的早期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杨坊之后，虞洽卿这位宁波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既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又被强调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幕后推手和元凶之一。

这一时期，国际学术界则在宁波商帮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20世纪50年代初，根岸佑相继出版《上海的行会》（日本评论社1951年版）、《中国的行会》（日本评论新社1953年版）等著作。其中《上海的行会》第一章即为关于上海的宁波帮行会的研究，主要考察上海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商帮与江浙财团诸问题。在其他各章中，如在“上海钱庄行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总商会”等章中，同样用相当大的篇幅述及宁波商帮。《中国的行会》在论及清代以来中国地域商帮实力消长的过程时指出：清代中国工商领域中以山西、三江、广东、福建为四大商帮，到《南京条约》签订后，四大商帮逐渐演变为山西、宁波、广东三帮独领风骚，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山西商帮由于没有能够及时调整投资方向发展近代工业而逐渐衰败，而宁波商帮、广东商帮则分别以上海和广州、香港为依托在工业领域获得快速成长。民国初年以后，广州成为国民革命军与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争夺的战场，香港则偏处华南一隅，广东商帮发展受到限制的同时还受到内战的很大削弱，宁波商帮则以上海尤其是租界为依托，继续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帮。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美国等国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宁波商帮颇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和著述。如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清末的宁波商人》（《东洋史研究》第26卷第1、2号，1967年6、9月）、美国学者苏珊·曼·琼斯（Susan Mann Jones，又译曼素恩）的《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庄》（威廉·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经济组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及《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伊懋可和施坚雅合编《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傅衣凌著作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页。

《宁波及其腹地》(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苏珊·曼·琼斯的两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宁波商帮在宁波和上海两地钱庄业经营和发展的情况,其中《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通过对抗战前宁波商帮在上海金融业中巨大经济力量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的亲属、同乡关系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尤其是同乡关系成为中国城市中连接家族、阶级、商业利益的主要渠道。这篇文章是探讨宁波帮金融势力在上海发展的原因的代表性论文。^①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有斯波义信撰“宁波及其腹地”一章,以宁波城市经济中心地位为主,探讨了宁波作为一个城市的内部结构,并将其与腹地结构相联系,强调地区经济对地方体系专业化的依赖,探讨了宁波作为一个海外贸易中心及地区中心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宁波帮商人及金融家先面向上海,再面向中国全国各商业中心的大扩展相联系,提出了一系列能够给人启发的看法。^② 日本学术界关于吴锦堂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如:陈德仁《华侨巨子吴锦堂》,载《神户中华总商会报》(1972年2月10日);山口政子《关于在神(户)华侨吴锦堂》,载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严南堂1983年版;陈德仁、安井三吉著《孙文与神户》(神户新闻出版中心1985年版);陈德仁编著《辛亥革命与神户》(孙中山纪念馆1986年版);山田正雄《阪神中华会馆的创立》,载《史学研究》第57号;川边贤武《吴锦堂与神户小束野开垦》,载《历史与神户》第2号;中村哲夫著《移情阁异闻——孙文与吴锦堂》(阿吡社1990年版);陈来幸《日本中华会馆研究》(载《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通讯》第29号,1996年2月);陈来幸《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以中华会馆为中心的考察》(载《近百年日中关系史的变迁与阪神华侨》,神户大学国际文化部1997年3月版);安井三吉《阪神中华会馆有关史料及研究状况》(载《近百年日中关系史的变迁与阪神华侨》,神户大学国际文化部1997年3月版)等。^③ 从日本学者到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出宁波商帮这个课题的巨大学术魅力。

① [美]苏珊·曼·琼斯著,陈增年、乐嘉书译:《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455页。

② [日]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见[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303、469—526页。

③ [日]森田明著,雷国山译:《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虞和平:《吴锦堂与日支实业协会》,载《吴锦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